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文贯中 刘愿*

摘要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 “大跃进”饥荒,公共食堂,退堂权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现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

——杨继绳(2008,第679页)

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西谚

一、前言

始于1958年夏秋之间的人民公社运动迅即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¹二是同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²然而,两者本身的成因及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仍无定论。Lin(1990)用农民退社自由的丧失来解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一假说无疑极具说服力。不过这一假说显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大饥荒,因为从1961年下半年直至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之前,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农民始终没有退

*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刘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刘愿,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电话:(020)39310072;E-mail:hope428@163.com。作者感谢熊金武、朱学勤、张可乐,以及复旦高等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研讨会的所有参加者对本文所提出的建议和评论。作者对本文遗留的错误承担所有的责任。

¹ Wen(1993, pp. 1—41)。

² 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估计在1700万—3000万之间,因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具体参见刘愿(2010)注释1的说明。

社自由,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始终低迷不振,但类似“大跃进”饥荒这样的严重饥馑却没有再度发生。³因此,若要研究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在1958—1961年期间较其后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必定要寻找比退社自由权更为重要的机制。

中国官方至今称这次饥荒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半个世纪来,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这场饥荒是人祸而非天灾所致。已有的比较有解释力的假说包括城市偏向政策(过度征购)、政府救济不力、缺粮区偏向政策、政治激进主义和公共食堂制度等。⁴回顾5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一个仍未得到充分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期间,1958年秋粮增产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往年的情况下,饥荒已在局部地区爆发;在肆虐整整三年后,当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处于最低值时却于1961年下半年起结束?粮食供应下降、城市偏向、政府救济不力等假说似乎难以解释这一难题。摒除了公共食堂内容的政治激进主义事实上在1962年后的中国愈演愈烈,最后导致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却再未引起饥荒。相反,公共食堂制度,包括其逻辑延伸的自留地的剥夺和家庭副业的禁止,在1958年秋在全国各地强制推行,期间经历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却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完全重叠。本文旨在证明,这种时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因而,我们在承认“大跃进”饥荒加剧的多种成因的同时,明确将公共食堂制度视为“大跃进”饥荒的触发、加剧和结束最为重要的成因。

本文基于中国农民从公共食堂自由退出的权利(为区别于退社权和行文的简洁,本文简称“退堂权”)在1958年的丧失、直至1961年年中的复得,来解释公共食堂制度的兴起和消亡如何触发、加剧并最终结束大饥荒的。全文结构如下:第二节评论现有假说;第三节以四川、云南、甘肃三省为例分析公共食堂所造成的粮食浪费如何在1958年年底触发饥荒;第四节研究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将农民全部口粮强制性集体化为主要标志的公共食堂制度如何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机制进一步加剧饥荒;第五节研究农民退堂权的重获如何帮助结束饥荒;第六节总结了公共食堂对饥荒的全过程的作用机制;第七节利用25个省区1958—1962年面板数据对饥荒各成因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退堂权假说;第八节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揭示赋予经济行为人自由选择权、约束政府强制权的至关重要性。

³ 在Lin(1990)引用的Wen(1989)所计算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中,以1952年为100,大饥荒时期1960年、1961年为78.4、78,1971年、1972年仅为76.5、72.2,低于1960—1961年的水平。1960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1971年死亡率仅为7.32%(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2页)。

⁴ Yang(2008)对“大跃进”饥荒成因的各种假说做了全面的综述和评论。

二、文献述评

如上所述，目前解释饥荒成因的假说包括粮食供应下降、城市偏向政策、政府救济不力、缺粮区偏向政策、政治激进主义和公共食堂制度等。本节对各种假说做如下评论。

（一）粮食供应下降

中国官方一直将“大跃进”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称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⁵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将1959年、1960年的农业减产和生活困难归咎为“严重自然灾害”，⁶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严重自然灾害”的说法并广为流传。即使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虽然承认“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仍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归因为“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⁷这一说法甚至影响了部分学者的判断。例如，Yao (1999) 认为大饥荒的首要原因，在于恶劣的气候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续下滑，使中国粮食产量1959—1961年连续下降。其他研究均将粮食产出下降作为大饥荒成因之一考察。⁸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1959—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确实连续下降，但粮食产出下降并非大饥荒的充分条件。如图1所示，从成灾面积来看，1959年全国成灾面积为1373万公顷，饥荒前后的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成灾面积均超过1959年水平，分别为1523万公顷、1498万公顷、1667万公顷、2002万公顷，但这四年并未发生饥谨。从人均粮食产出来看，195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出为255公斤，1962年人均粮食产出仅为238公斤，1963年略增至246公斤，分别比1959年低6.7%和3.5%。正是在人均粮食产出下降的情况下，大饥荒却在1961年年中之后迅速结束。因此，因自然灾害所致的粮食减产并非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国官方将“三年经济困难”部分归因为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这一说辞不符史实。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大饥荒

⁵ 见《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人民日报》，1960年10月1日。

⁶ 见《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年。

⁷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⁸ 如 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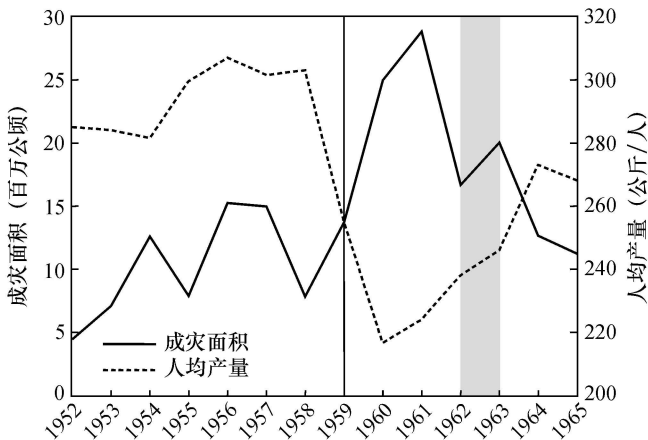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1952—1965年成灾面积、人均粮食产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0），国家统计局（1980，第2页）。

已起码出现半年有余。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与农业生产无关的专家和科技合同，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一年有余。历史事实是，1961年3月苏联政府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⁹因此，所谓“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不可能是大饥荒的起因。

（二）城市偏向政策

Bernstein (1984) 发现，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一样，中国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多地将资源（主要为粮食）从农村强制转移至工业部门和城市，即通过农业集体化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征购率，从而导致了“大跃进”饥荒。Walker (1984) 考察了中国的粮食收购制度及粮食消费，提出“大跃进”时期的粮食高征购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Lin and Yang (1998, 2000) 认为，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权受到法律保护，并构成了农民的强制性负担。在粮食产出下降的情况下，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地区农业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并对28个地区1954—1965年面板数据作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偏向政策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较粮食产出下降因素的作用更大。Kung and Lin (2003) 同时运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和粮食净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进一步证实了城市偏向政策对饥荒的重要作用。曹树基 (2005) 发现“大跃进”饥荒与太平天国时期分府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呈强负相关，因为“饥荒的历史记忆”使在太平天

⁹ 见杨继绳(2008,第588—596页)。

国时期经历饥荒的地区对粮食的重视远超过未经过饥荒的地区，在“大跃进”中较少浮夸其粮食产量，从而较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粮食征购的高压，减轻了这些地区在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

城市偏向说的立足点是粮食高征购。但高征购本身只有在造成太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和消费量时才会带来饥荒。所以，在承认高征购无疑是加重“大跃进”饥荒的重要成因之一的同时，必须审视这段时期的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和消费量。¹⁰我们发现，这一假说无法解释为何一些地区在1958年年末就出现了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例如，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调出大省。1958年四川人口死亡率突增至25.17%，比上年增加109%。¹¹1958年四川粮食征购量虽有所提高，但由于粮食增产及农村返销粮提高，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7年的213.8公斤增至1958年的232.6公斤，增幅为8.8%。¹²因而，高征购假说无法解释为何死亡率却提高逾一倍。同样，甘肃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7年的248公斤增加至263公斤，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7年的176公斤增至1958年的190公斤，死亡率却从11.33%提高到21.11%。¹³

再以人均粮食消费量为例，如果粮食高征购减少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是导致饥荒的主要机制，则同一假说显然无法解释饥荒的结束。1961年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只有154公斤，为建国以来最低值，但饥荒在1961年下半年即迅速结束（见第五节的分析）；1962年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只有161公斤，比1959年的183公斤低12.3%，但除四川省外饥荒已经完全结束。¹⁴（四川的情况见第五节第3小节。）因此，以粮食高征购为主的城市偏向政策既无法解释饥荒为何在粮食增产时爆发，更无法解释饥荒在农民人均消费量下降到最低点时不是趋于加剧，而是迅速结束。

（三）政府救济不力

Sen (1983) 比较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自由的新闻媒体及政治压力集团，使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饥荒。Lardy (1987) 考察了“大跃进”饥荒时期的政府救济行为，发现在“大跃进”时期，由于

¹⁰ 1958—1961年全国粮食征购率从1957年的24.6%提高到29.4%、39.7%、35.6%、27.4%，粮食征购总量及征购率在1959年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值。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70页。

¹¹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690页)。

¹² 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返销粮)/年均农业人口,如未特别说明下文同。1958年四川征购粮食(贸易粮)107.63亿斤,比1957年增加8.01亿斤,但考虑到粮食增产及农村返销粮增加,粮食净征购率反而从1957年的25.3%略降至24.7%(农牧渔业计划司,1983,第172、390页)。

¹³ 云南省情况例外,“大跃进”政策与粮食减产可能是云南饥荒的成因。在1956年粮食产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值后,1957年、1958年云南省粮食产量连续下降,分别减少了3%、10%。1958年云南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27公斤,比1957年的237公斤减少4%。粮食数据来源于农牧渔业计划司(1983,第394—395页),死亡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829页)。

¹⁴ 粮食消费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贸易物价统计司(1984,第27页),死亡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2页)。

地方自给自足观念及浮夸风的作用,地区间的商品流动受到限制,市场普遍关闭导致农村贸易被破坏,农村缺粮区农民在政府救济不足的同时又难以从市场上获取粮食,从而加剧了缺粮区农民的死亡。周飞舟(2003)发现11个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大都对灾荒做出了实际的反应,加大省内粮食返销,但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反应和救助十分有限;其中6个省份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¹⁵这表明虽然大部分省都知道灾荒实情并发放返销粮救荒,但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粮食,延误了及时救荒。

政府救济不力假说得到最新披露的史料的支持,在饥荒肆虐全国农村之际,各级粮库中却保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库存,这无疑加剧了饥荒。¹⁶不过要指出的是,这一假说不能解释饥荒的触发原因,只能用来解释饥荒加重的原因。而且像城市偏向假说一样,无法解释为何在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降到最低水平的时候中国走出了饥荒。事实上,由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灾荒频发,广大农区,特别是在低产区和常年受灾区,农民素有节约粮食生产自救的传统。¹⁷即使缺乏外部援助,如果农民合理安排消费并进行生产自救,仍可大大降低灾荒影响,况且灾民还可以通过逃荒寻找生机。正如后面第四节所述,在“大跃进”饥荒中,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的合理安排消费、生产自救和逃荒的机制,被公共食堂制度破坏了,饥荒加剧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公共食堂制度。

(四) 缺粮区偏向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认为城市偏向说可以用来解释饥荒时期城乡死亡率的差异,但却无法解释同一个省内农村地区死亡率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农村地区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首先得到体制上的食物供给保障,其次是农村中缺粮区群体,最后是粮食主产区的居民。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最容易遭受饥荒威胁。他们分别利用1954—1966年28个省级数据和1954—1966年江苏省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¹⁵ 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

¹⁶ 例如,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201.75亿公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杨继绳,2008,第753页)。各级政府之所以未能及时开仓放粮,一是不相信农村缺粮(如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二是即使了解农村实情,基层干部也担心冒政治风险而不愿救济农民;三是粮食库存主要是为了供应城市人口及出口换汇。

¹⁷ 党国英(2007)记录了一个华北村庄农民应对粮食紧缺的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比例为一斗二升麦子换一斗高粱。这一不合理的兑换比例背后反映了农民的理性: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减少粮食用量。

实际上,在正常年景,缺粮区农民的粮食配额一般比产粮区农民低。¹⁸在“大跃进”饥荒时期,由于各级政府隐瞒灾情及可调配的粮食有限,农业返销粮并未有效缓解缺粮区农民的饥荒。1959—1961年每一农业人口年均返销粮仅为56.9斤,低于1954年长江流域水灾年份的63.9斤。¹⁹考虑“大跃进”时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和受灾人口大幅增加,缺粮区农民人均返销粮数量会更少。从农业返销粮总量上看,1960—1961粮食年度农村返销粮分别为362.08亿斤,远低于1957—1958粮食年度的419.66亿斤。²⁰刘愿(2010)以地区农村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衡量缺粮区偏向政策,运用1953—1966年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的模型分析并未发现支持缺粮区偏向的证据。拉第甚至认为,由于在“大跃进”时期地区间的商品流动受到限制,因此在大饥荒时期死亡集中发生在农村非粮食生产者中。²¹

(五) 政治激进主义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诠释政治激进主义在饥荒中的作用。Yang (1996)、Yang and Su (1998)认为,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下级以服从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来显示对中央权威的忠诚,贯彻执行中央偏好的制度便成为从省到村庄各层级干部表示忠诚的方式。他们发现地区党员人口密度越低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率越高,地区政策越激进,饥荒越严重。政治激进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整27年中,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直至十年“文革”。但是这种激进主义离开了公共食堂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导致饥荒。只有当公共食堂制度被中央权威确定为一项“好制度”之后,将这一制度作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激进主义才引起和加剧了饥荒。这等于说,有了公共食堂内容的政治激进主义假说和公共食堂假说是等价的;而缺乏公共食堂具体内容的政治激进主义则并不具有任何解释力。

Lin and Yang (1998)强调,狂热的省级领导人为了向中央政府显示对“大跃进”政策的忠诚,大量将本省粮食往中央政府调运。Kung and Lin (2003)认为,为了使中央政策在新解放区得到贯彻执行,中央向新解放区派遣了大量的南下干部。为了显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方地区的领导人比北方地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激进政策,如大兴水利和大炼钢铁等。这些高消耗工程增加了劳动力的热量需求,在下季收获前加速了粮食供给消耗,从而导致饥荒。Yang (2008)认为,这些因高强度劳动所引起的健康因素,加

¹⁸ 根据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计划种植技术作物的缺粮户口粮、饲料粮用粮标准不低于当地余粮户的用粮标准外,一般产粮区的缺粮户、灾区缺粮户、农村非农业人口口粮、饲料粮标准低于当地余粮户或当地正常年景缺粮户的用粮标准。

¹⁹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510—511页)。

²⁰ 杨继绳(2008,第752页)。

²¹ 尼古拉斯·R.拉第(1987),见费正清、麦克法夸尔(1993,第411—413页)。

上粮食大量外调,可能是四川、云南、甘肃1958年死亡率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即使考虑粮食调运,²²1958年四川、甘肃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比1957年分别增加8.7%和7.6%。因此,粮食调运不能成为四川、甘肃1958年饥荒的诱因。再考察Kung和Lin主张的高消耗工程所引起的健康因素的作用。实际上,在“大跃进”背景下,农村大兴水利和大炼钢铁运动波及全国,四川并非最激进者。如果以钢产量增长率来衡量政治激进程度,²³1957—1958年全国钢产量增加了49.5%,四川省钢产量仅增加34%,同属于新解放区的广东省钢产量增加逾15倍,湖北省钢铁产量增加60%。²⁴因此,Kung和Lin主张的不以公共食堂为特定内容的政治激进主义无法解释,为何其他地区在大炼钢铁中更为激进但并未像四川省那样在1958年死亡率骤增。

(六) 公共食堂

Chang and Wen (1997, 1998)对公共食堂在饥荒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们认为,饥荒实际上在粮食增产的1958年即发生,粮食产出下降、粮食出口、粮食高征购及人口增加并非触发饥荒的诱因。公共食堂在兴办初期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和免费供应制,造成严重粮食浪费,引发了最初的饥荒;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减少了随后农村粮食供应,公共食堂制度赋予基层干部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特权进一步加重了饥荒。他们发现,1959年年末公共食堂参与率与累积的非正常死亡率正相关,并且食堂的结束和饥荒的结束同时发生,加强了食堂对饥荒的解释力。

Kung and Lin (2003)在对21个省区1958—1961年的数据计量分析中,同时引入公共食堂参与率、解放时间及党员人口密度,结果显示以解放时间代表的政治激进主义对地区死亡率有显著影响,但并未发现公共食堂影响饥荒的证据。他们认为原因有三:第一,公共食堂并非像政治口号宣传的那样免费供应,而是普遍实行配给制;第二,公共食堂在1959年春就变得不普遍了,许多食堂事实上已经是季节性而非长期的,农民甚至允许在家做饭;第三,1960年地方政府重新抓紧兴办公共食堂,但粮食大幅减产已经无法维持公共食堂的浪费行为。可是,本文从退堂权的新视角对公共食堂制度再次审视的结果表明,上述三点看法不足以否定公共食堂制度在饥荒中的重

²² 实际上,省向中央调运的粮食本质上是征购粮,强调粮食大量外调与粮食高征购并无二致。

²³ Kung and Lin(2003)认为钢产量及灌溉面积能够反映地区政治激进程度,但全国和各省灌溉面积只有1952年、1957年、1962年、1965年间隔的数据。钢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²⁴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以紧随毛泽东激进政策而闻名,是与李井泉、曾希圣、柯庆施、吴芝圃、舒同齐名的“左”派封疆大吏。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18、572、630、707页)。

要作用。

(七) 为何再次考察公共食堂：退堂权的新视角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春夏的三年间，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哄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央批准退堂权、食堂全面解散”四个阶段。²⁵公共食堂的危害，不仅在于初期的粮食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分配和消费口粮的自由。一旦农民重新获取了这种自由，即使粮食产出还没有来得及显著增长，农民仍能迅速摆脱饥荒。一般而言，强调运用系统数据及计量模型考察各种因素对饥荒的作用应该是应该的，但这次饥荒时期的一些数据，特别是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和食堂的制度因素等，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又是难以获得或难以量化的，使饥荒研究进展不尽如人意。²⁶近年来以杨继绳的《墓碑》为代表的专著所披露的相关史料，使人们得以重构大饥荒时期从农村到城市、从普通农民到最高决策者的生动图景，丰富了人们对大饥荒，尤其是公共食堂制度对饥荒的作用的认识。大量地方性史料使饥荒研究从现有的全国和省级的宏观层面扩展至县、公社、村庄、生产队甚至个人的微观视角成为可能。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根据历史逻辑方法和有关自由进退的经济理论，揭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是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将农民全部口粮强制性集体化为主要标志的（为行文简洁，以下涉及以此为定义的公共食堂制度一律简称“食堂制度”），并证明这一制度的兴衰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终结在时间上重叠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内在因果关系。

三、食堂是如何触发饥荒的

关于饥荒发生的时间，研究者存在分歧。²⁷但确定无疑的是，1958年四川、云南、甘肃三省人口死亡率比1957年分别提高108%、33%和86%，成为首先爆发饥荒的地区。本节分析食堂如何触发饥荒，重点研究食堂在川、云、甘三省1958年饥荒中的作用。

²⁵ 杨继绳(2008,第666页)。

²⁶ 如Johnson(1998)指出,除非获取大量数据及构建复杂模型,要研究各个因素对饥荒的联合及独立作用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²⁷ Chang and Wen(1997)认为在1958年年末个别地区即发生饥荒,1959年年初饥荒已蔓延至许多地区。Lin and Yang(2003)则认为1958年全国人口死亡率小幅度上升,是由于四川、云南、甘肃三省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所致,因此饥荒在1958年只是个别现象,直至1959年饥荒才在全国蔓延。事实上,统计数据只公布全年人口死亡率,我们很难据此判断某年人口死亡是发生在年末还是年初。

(一) 食堂对口粮的强制性集体化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煮饭吃的习惯,在互助组时期农忙时节出现了吃“转转饭”,²⁸进入合作社时期后某些地区出现临时性的农忙食堂,其中少数农忙后也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这段历史表明,农村食堂在公社建立前就应需而生,完全是群众自发行为,犹如社区饭店一样,是基于自愿原则的一种节约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制度安排,与公社时期的强制性食堂有本质区别。²⁹

1958年夏某些公社提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的确吸引了一部分低生产力的农民,造成农民积极拥护办食堂的假象。1958年秋随着人民公社化推向全国,各地食堂也就普遍兴办起来。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办好食堂称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³⁰党的喉舌对食堂提到如此高度,无疑是正式向全国发出了最明确的大办食堂的明确指示。于是食堂在各地一哄而起。到1958年年底,短短两个月内全国的农村食堂已达340多万个,用餐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90%。³¹

由于办食堂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³²,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强制剥夺农民口粮的办法推行:1958年秋收后农民消费的口粮直接进入食堂仓库,不再首先分配给农民;³³办食堂的场所、座椅板凳、厨具也大都从农民那里剥夺、征用而来;很多地区甚至将农民家里做饭的锅砸掉,禁止农民家里生火起烟;³⁴后期食堂面临食品匮乏,在反瞒产私分的名义下,公社甚至到农民家里突然袭击,强行搜刮粮食。³⁵由于把办食堂视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不愿加入食堂的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施加强大政治压力,使大部分农民被迫加入食堂。³⁶

(二) 食堂严重浪费粮食

强制性食堂最先引起的弊病是浪费粮食。首先,办食堂刮起了严重的共

²⁸ 即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有时也由几家凑米凑菜煮饭吃。(罗平汉,2001,第1页。)

²⁹ 罗平汉(2001,第1—3页)。

³⁰ 见《办好公共食堂》,《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5日。转引自黄道霞(1992,第508—509页)。

³¹ 罗平汉(2001,第36页)。

³² 1958年人民公社创办后,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公共食堂被提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心脏地位,可见其在人民公社中的重要地位。(武文军,2002,第94页)

³³ 罗平汉(2001,第81页)。

³⁴ 党国英(2007)。

³⁵ 文贯中(2009)。

³⁶ 罗平汉(2001,第15页)。李若建(2004,第77页)指出办公共食堂是“上级希望做,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但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欣赏,决定了全国上下对办公共食堂的热情。

产风,³⁷农民担心存粮被共产,在加入食堂前大肆吃喝掉;³⁸一些社员常常深更半夜悄悄将自己的鸡、鸭、鱼等杀了煮食。³⁹私藏粮食的农民担心被批斗便半夜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再来家里搜出粮食。⁴⁰甘肃通渭县在办食堂初期,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⁴¹

其次,吃饭不要钱导致严重的粮食浪费。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普遍实施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方式。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成为食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⁴²农村不同社会阶层对“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制度褒贬不一,⁴³但自愿性食堂的“种种优越性”被中央媒体夸大,尤其是毛泽东1958年9月在安徽视察时发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的号召后,⁴⁴免费供应制便在全国食堂普遍实行。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的信中即批评了放开肚皮吃饭的现象。⁴⁵在食堂推行敞开肚子吃饭期间,“一些乡村农民在三个月内就吃掉足以维持六个月的粮食”。⁴⁶有的食堂甚至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⁴⁷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1960年冬天向毛泽东汇报食堂情况时指出三大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⁴⁸

上述判断得到大量史料的支持。1958年11月四川什邡县和武隆县食堂面向全县居民免费供应食物。1958年10月,在河南、河北、辽宁、安徽、山东的5254个公社中,61.3%计划免费供应食物,21%计划供应免费粮票,15%计划免费供应食物和衣服,2.7%免费供应食物、住房、交通、家具、医疗、教育等。⁴⁹1958年9月18日安徽省舒城县舒茶公社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社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⁵⁰江苏省武进县寨桥公社贝桥食堂1958年10月吃过五次面条,二

³⁷ 杨继绳(2008,第665页)。

³⁸ Chang and Wen(1997,p.20)。

³⁹ 例如,在办公共食堂过程中强令搬家,1958年11月山东省滕县界河红旗人民公社赵辛街耕作区宰羊200余头,杀鸡3000只;龙山店村3天吃羊10头,鸡2500只。(罗平汉,2001,第82、85—86页)。

⁴⁰ 党国英(2007)。

⁴¹ 杨继绳(2008,第144页)。

⁴² 罗平汉(2001,第49页)。

⁴³ 例如,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劳力少者、青年妇女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表示反对,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食堂持观望态度(胡代光,1958)。

⁴⁴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县时得知该县夏秋两季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6日。1959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视察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罗平汉,2001,第60页)

⁴⁵ 彭德怀(1981,第286页)。

⁴⁶ Peng(1987,p.664)。

⁴⁷ 赵广生(1988,第109页)。

⁴⁸ 杨继绳(2008,第681—682页)。

⁴⁹ 见Chang and Wen(1997,注31,第31页)。

⁵⁰ 《饭菜尽吃饱,干劲鼓得高》,《安徽日报》,1958年11月29日(罗平汉,2001,72—73页)。

次饼子,三次团子,二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荤菜半月各不同样;⁵¹11月每天一干二稀,早晚各两个菜,中餐三菜一汤。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⁵²过去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标准仅为1斤零5钱。⁵³

可见,食堂粮食浪费在当时相当普遍,只是各地严重程度及维持时间不同。当时在国家统计局及国家计委担任领导的薛暮桥估计1958年农民由于过度消费浪费的粮食数量高达1750万吨,⁵⁴相当于1958年农村粮食供应量的11%。⁵⁵在人民公社初期,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仍然生活在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农民必须在两季收获期间合理安排粮食消费,有时甚至需要过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任何的粮食浪费或过度消费极可能在下次收获前即耗掉其粮食储备,从而导致饥荒。⁵⁶1958年粮食仅比上年增产2.6%,食堂却至少造成11%的粮食浪费,无疑导致了严重食物短缺,从而引发饥荒。

(三)川云甘的情况

食堂作为“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在全国普遍推行,⁵⁷粮食浪费行为也具有普遍性。为何饥荒首先在川、云、甘爆发?各地食堂粮食浪费对饥荒的作用,因地区激进程度、食堂参与率、农村留粮数量等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其他地区1958年年末未出现饥荒,可能是这些地区的食堂浪费行为较四川、云南、甘肃较轻所致,以致直到1959年其严重后果才显现。⁵⁸换言之,川、云、甘在兴办食堂上较其他省区更为激进,其中尤以四川省为甚。如何考察川、云、甘1958年在食堂上的激进政策?

从1956年全国推行高级农业合作社至1958年秋人民公社成立期间,尽管存在个别的强迫命令现象,农民入社仍享有自主权(Lin,1990)。因此,1956年高级社参与率反映了该地区农民参加农业集体化的真实意愿。1958年全国99%的农民被迫加入规模更大、公有制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一个合理的推论是,1956年高级社参与率越高的地区,1958年并大社成立人民公社就越容易,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风越轻,该地区食堂的激进程度也越低;反之

⁵¹ 《菜好饭香,干劲洋溢》,《新华日报》,1958年11月22日(罗平汉,2001,第74—75页)。

⁵²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编辑委员会(1989,第143页)。

⁵³ 罗平汉(2001,第72页)。

⁵⁴ 薛暮桥(1984,第90页)。薛暮桥(1996,第265页)在时隔12年后再次强调指出公共食堂的浪费,“当时农民议论最多的是公共食堂,1958年冬天开始提倡在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放开肚子吃饭’,把一年的口粮在半年中吃完了。农民分不到口粮,除了原有的少量存量,只能吃瓜菜野草”。

⁵⁵ 1958年农村粮食供应量为15830万吨(Chang and Wen,1997,注76,第33页)。

⁵⁶ Peng(1987,p.664);Chang and Wen(1997,p.20)。

⁵⁷ 罗平汉(2001,第27页)。

⁵⁸ Yang and Su(1998,p.144)指出,饥荒实际上在1959年春天至少已经在10个省的部分地区出现。

亦然。

如表1所示,1956年全国高级社参与率为62.6%,排除三个直辖市,高级社参与率最高的有河北(99.4%)、黑龙江(98.7%)、河南(97.2%)等农业生产大省。同为农业大省的四川,1956年高级社参与率仅为7.4%,在全国各地区中参与率最低,69.3%的农民选择加入经济核算单位较小的初级农业合作社。⁵⁹在可以自主选择时,四川农民最抵制更大规模形式的合作社,但在1958年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时,高达95%的农民被迫加入食堂。

表1 各地区高级农业合作社、食堂参与率

单位:%

| 东 部 | | | | 中 部 | | | | 西 部 | | | |
|-----|------|------|------|-----|------|------|------|-----|------|------|------|
| 地区 | 1956 | 1958 | 1959 | 地区 | 1956 | 1958 | 1959 | 地区 | 1956 | 1958 | 1959 |
| 北京 | 99.6 | — | 87.4 | 山西 | 97.9 | 85.6 | 70.6 | 广西 | 62.2 | — | 81 |
| 河北 | 99.4 | 94.0 | 74.4 | 内蒙古 | 77.5 | — | 16.7 | 四川 | 7.4 | 95.0 | 96.7 |
| 辽宁 | 91.8 | — | 23.0 | 吉林 | 95.7 | — | 29.4 | 贵州 | 27.9 | — | 92.6 |
| 上海 | 90.9 | — | 94.5 | 黑龙江 | 98.7 | — | 26.5 | 云南 | 51.6 | 72.9 | 96.5 |
| 江苏 | 78.9 | 97.0 | 56.0 | 安徽 | 80.7 | 72.8 | 90.5 | 陕西 | 65.2 | 94.2 | 60.8 |
| 浙江 | 60.0 | — | 81.6 | 江西 | 62.2 | — | 61 | 甘肃 | 34.5 | 100 | 47.7 |
| 福建 | 62.2 | — | 67.2 | 河南 | 97.2 | 98.0 | 97.8 | 青海 | 9.2 | 90.0 | 29.9 |
| 山东 | 67.2 | 82.0 | 35.5 | 湖北 | 69 | — | 68.2 | 宁夏 | — | 75.2 | 52.9 |
| 广东 | 44.1 | — | 77.6 | 湖南 | 13.8 | — | 97.6 | 新疆 | 42.1 | — | 85.1 |
| 全国 | 62.6 | 90.0 | 72.6 | | | | | | | | |

注:1956年数据为各地区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户参与率,“—”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1956年数据来源为(史敬棠等,1959,第1019页),1958年数据来源为(范子英等,2008,第302页),1959年数据来源为(Chang and Wen, 1997, pp. 24—26),宁夏1958年数据来源为(黄道霞等,1992,第510页)。

可见,四川省各级政府在实现人民公社化及食堂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激进。河北、江苏、河南、山西1958年食堂参与率也超过90%,但这些地区1956年高级社参与率也较高。

1959年春至庐山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不少地区解散了食堂。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之后,是否拥护食堂重新成为路线之争,各地区又恢复了食堂,但受前期教训影响,大部分地区食堂覆盖率明显下降。全国食堂参与率从1958年的90%下降至1959年的72.6%,河北省食堂参与率从1958年年底的94%下降至74.4%,山东省从82%下降至35.5%,即使是极“左”的河南省,食堂参与率也从98%略降至97.8%。然而,四川省在庐山会议后,食堂参与率反而从1958年年底的95%升至1959年年底的96.7%。可见,四川省对人民公社及食堂制度最为积极。

云南和甘肃1956年高级社参与率分别为51.6%和34.5%,均低于全国水平。1958年云南食堂参与率为72.0%,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食堂参与率大

⁵⁹ 1956年全国62.6%的农民加入高级农业合作社,但四川仍有69.3%的农民选择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史敬棠等,1959,第1012、1019页)。

幅度提高到96.5%，云南对食堂制度热情高涨，而且云南1958年农村人均留粮比1957年下降7.6%。⁶⁰甘肃省在1958年夏秋就实现了全省食堂化，⁶¹加上甘肃省农村人均留粮水平偏低。⁶²在农村留粮不足的情况下，食堂的严重粮食浪费必然触发1958年饥荒。

概言之，是以食堂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政策，而不是任何激进政策才是川、云、甘最早爆发饥荒的主要原因。

四、食堂是如何加剧饥荒的

如上所述，1959年春夏之际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纠偏措施，食堂在全国各地有所退却。⁶³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重新掀起“反右倾”运动高潮，反对食堂的干部群众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遭受严厉打击。因此，从庐山会议后至196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赋予农民退堂权，中国农民被牢牢禁锢在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将农民全部口粮强制性集体化为主要标志的食堂制度下，苦不堪言。食堂降低了生产率、助长村干部贪污腐化，并方便了他们的滥权行为；同时，农民在食堂之外，已没有任何食物来源，甚至连逃荒机制也被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大饥荒。

(一) 食堂降低生产率

名义上，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部分按需分配，工资部分按劳分配。⁶⁴但实际上，大多数公社的生产力低下，农民所挣工分除了换取生存所需的粮食等必需品外，并没有多少剩余工分可从公社支取工资，所以工资比重不大。相当多公社在公社化初期发了一两次工资后便无力再发。⁶⁵这表明在人民公社分配体制下农民真正能得到的分配主要是口

⁶⁰ 1957年云南农村人均留粮237.6公斤/人，1958年为227.4公斤/人(农牧渔业计划司，1983，第394—395页)。

⁶¹ 甘肃省从1958年8月开始到10月短短三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全省食堂化。西礼县1958年8月11日仅有51.8%的农户加入公共食堂；到8月22日，仅仅11天，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比例骤增至84.5%。见赵继士(2008)。1958年甘肃通渭县在一个月內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杨继绳，2008，第144页)。

⁶² 1958年甘肃农村留粮比1957年增加7.6%，达到189公斤/人，但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8公斤/人，在25个省区中排倒数第5位。1957年甘肃农村人均留粮只有176.2公斤/人，排倒数第二位。可见，甘肃农村留粮一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列(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343、400—401页)。

⁶³ 例如，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1958年年底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农户数的19.65%，比1958年年底减少了80%(杨继绳，2008，第670页)。

⁶⁴ 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均提出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两个公社的章程被《农村工作通讯》、《红旗》杂志转载，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黄道霞，1992，第485—493页)。

⁶⁵ 从实现公社化到1958年11月，河南新乡地区有152个社发了一次工资，34个社发了两次工资，19个社发了三次工资，总共发工资710万元，每人平均2元左右(罗平汉，2001，第64页)。

粮，而此时口粮已经成为供给制的主要内容。由于农民口粮全部进入食堂的仓库，这意味着口粮实际上被强制性地集体化了。食堂虽然初期实行敞开供应，免费吃饭，但因为浪费导致粮食短缺，后来食堂表面上也规定了不同群体的口粮标准，但在同一群体内不管工作好坏、快慢，实际上采取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这种由公共食堂强制实行的口粮供给制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⁶⁶

1959年1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分配问题，要求“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一半”。⁶⁷实际情况是，从全国情况来看，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中，现金收入仅占24%左右，即人民公社工资部分仅占1/4。⁶⁸

食堂是在据称具有节约粮食、劳动力和柴火等种种“优越性”的背景下迅速推向全国的。⁶⁹事实表明，食堂弊病丛生，反而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1961年4月胡乔木在湖南韶山公社调研后就食堂问题向毛泽东汇报，指出了食堂的六大弊病：

“食堂问题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分别来说：(1)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1/3—1/2，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2)食堂不利于养猪等家庭副业，粪肥减少，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和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3)食堂烧大柴，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因为大柴灰少）；(4)由于食堂实行供给制，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也不劳动了；(5)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而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以及社员相互间的纠纷增多了；(6)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⁷⁰

可见，食堂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57年和1959年粮食单产说明了问题。如表2所示，1957年全国成灾面积为1488万公顷，1959年为1373万公顷，比1957年低8.3%。两年成灾面积占播种面

⁶⁶ 广东省新会县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具有典型意义。根据新华社记者杨文全1959年1月18日的报告，该公社发放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现象：(1)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2)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3)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4)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黄道霞，1992，第523页）。

⁶⁷ 黄道霞（1992，第527页）。

⁶⁸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510—511页）。

⁶⁹ 项珊，《公共食堂有十大好处》，《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中共南阳地委农村工作部，《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9日。李友九，《河南信阳来信》，《红旗》，1958年第7期。这些政治宣传成为全国各地鼓吹公共食堂优越性的论据。

⁷⁰ 见《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积比重相差不大。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情况下,1957年全国粮食每亩产量与1959年持平,但1957年每一农业人口粮食产量为361公斤,比1959年的317公斤高13.9%。除了抽调农村劳动力从事水利工程和大炼钢铁外,⁷¹食堂平均主义的负激励是大饥荒时期粮食产量下降的另一重要原因。

表2 1957年和1959年的农业生产情况

| 年份 | 成灾面积 (千公顷) | 成灾面积占播种 面积比重(%) | 每一农业人口粮食产量 (公斤/人) | 粮食每亩产量 (公斤/亩) |
|------|---------------|--------------------|----------------------|------------------|
| 1957 | 14 980 | 9.53 | 361 | 195 |
| 1959 | 13 730 | 9.64 | 317 | 195 |

数据来源:成灾面积及比重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0),粮食人均及每亩单产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80,第5、47、49页)。

(二) 食堂在克扣社员口粮的同时,为农村干部多吃多喝打开方便之门

在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忍饥挨饿之际,由于农民的口粮高度集中在食堂的仓库之中,由农村基层干部操控管理大权,这就为他们中作风不正者多吃多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干部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全国农村。例如,大饥荒时期河南信阳农村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干部贪污腐败、多吃多占是重要原因。⁷²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淮滨县杨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1959年10月上旬,杨坡大队农民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加红薯叶汤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只吃一顿菜,此后连续停伙五天。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根据中央“信阳事件”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报告,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占26.7%(1515人,死亡404人);左围大队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据河南省委检查组1960年6月7日报告,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

⁷¹ Li and Yang(2005)认为,“大跃进”运动时期农业资源被大量转移至非农领域及粮食高征购解释了61%的粮食减产。

⁷² 见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说:“据今年(1960年)10月份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本段引用资料见杨继绳(2008,第50—54页)。

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1959年秋至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多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面对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病，毛泽东不是迅速否定食堂制度，而是归因于民主革命不彻底。⁷³实际上，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其中，干部特殊化风实质是贪污腐败成风，以致中共中央1960年3月7日在批转河北省委《关于对干部参加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参加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食堂吃饭。⁷⁴可见当时干部特殊化风的严重性。但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干部特殊化风刹而不止，因为食堂的口粮强制集体化为干部贪污腐败提供了最大的制度性方便。

（三）食堂通过操控口粮赋予农村干部生死予夺的权力

为强迫农民在食堂吃饭，人民公社采取口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的办法，⁷⁵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权力滥用现象普遍，随意剥夺社员的吃饭权。⁷⁶1961年1月20日江苏省委干部李树仁反映了淮阴市农村干部层层克扣农民口粮的情况：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克扣社员的口粮。以淮阴市王兴公社为例，克扣口粮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0.4348斤，口粮总数为106514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1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粮为每天0.3971斤。小队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空头粮。两淮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0.5斤，

⁷³ 毛泽东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讲话中谈到信阳问题时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仍然认为2/3的地区是大好形势，1/3是不大好形势。不大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杨继绳，2008，第68页）。

⁷⁴ 杨继绳（2008，第674页）。

⁷⁵ 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规定“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和“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是由生产队掌握。根据杨继绳在12个省的调查，“指标到户、实物到堂”是全国各地的普遍做法。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农民就不到食堂吃饭，食堂就要垮台（杨继绳，2008，第670页）。果然，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3月18日整理了八个省公共食堂的情况，比较了“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和“现粮分到户、参加食堂时向食堂交粮食的”两种口粮分配方法，认为前一种方法对于掌握粮食、巩固食堂大有好处，粮食分配到户造成很大被动，并要求“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实行解决，一律按照河南、湖南、四川、贵州、上海、安徽六省市的办法（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去做为好”。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黄道霞等，1992，第601页）。

⁷⁶ 杨继绳（2008，第132页）。

但所属12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因此,大队给各生产队12月份的口粮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产指标(折粮19960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63800斤,缺36000斤⁷⁷(折粮7000斤)是空头数字。”

在鱼米之乡浙江也发生类似情况。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斤。⁷⁸江苏、浙江饥荒并不算严重,农村干部层层克扣农民口粮尚且如此普遍,在饥荒的重灾区,村干部滥权行为就更为严重。

干部滥用权力还表现在高额罚款、扣饭、体罚、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产,其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⁷⁹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饭。社员说,该生产队有“三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还有“三不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据对四川古兰县6个区22个公社调查,1960年1月到6月,干部打社员造成严重后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残6人、重伤7人、扣饭饿死7人,自杀多起。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被饿死。安徽凤阳县在1961年以后的纠偏中,群众揭发出前两年违法乱纪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026人(包括扣饭的15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伤残383人。⁸⁰

可见,食堂制度下干部扣饭、刑罚等滥权行为并非个案,在全国农村相当普遍,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农民的身体。

(四)食堂的强制性必然导致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食堂的存废和自留地以及家庭副业的存废有密切关系。原因很简单:第一,家庭养殖和自留地是家庭厨房的延伸。取消农民的家庭厨房,一律代之以食堂用餐,从逻辑上说,家庭厨房、家庭养殖和自留地的保留就成为多余。第二,食堂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后,从迫使农民参加食堂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剥夺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唯有这样,才能通过全面而彻底地控制农民的所有食品来源,强制性提高农民对食堂的参与率。所以,只要食堂是强制性的,必然导致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进一步加剧了饥荒。1959年年初至庐山

⁷⁷ 杨继绳(2008,第345页)。原文为“缺3500斤”,疑为笔误,实际计算结果为36000斤。

⁷⁸ 杨继绳(2008,第425—426页)。

⁷⁹ 杨继绳(2008,第196—197页)。

⁸⁰ 杨继绳(2008,第246—247页)。

会议前，中央的纠偏措施使不少食堂解散，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⁸¹但庐山会议将农民摆脱饥荒的机会吹掉了。

毛泽东1958年8月19日谈及人民公社时说：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及房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⁸²这种提法，不但导致农民的恐慌和提前捕杀家禽和家畜，也使干部闻风而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1959年8月30日在向四川省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说：“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给食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⁸³1960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认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中共中央2月26日、3月6日两次向其他各省批发该报告，要求“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⁸⁴因此，从中央到基层均将收回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视为办食堂之后的必然结果，农民因此失去生产自救、从食堂之外获取食品的渠道。

刘少奇1961年4月在湖南宁乡县调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天华大队在湖南虽然比较好，但粮食和副业生产比1957年都降低了，社员生活远不如1957年。这主要是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和芋头，田藤上的豆子，都喂了猪和鸡鸭，都有肉、油、蛋供自己食用和出卖，而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⁸⁵湖南宁乡县天华大队食堂有大米和小菜供应尚且感到不够吃，其他粮食紧张地区的农民生活则更加困难。

（五）食堂制度下农民连逃荒权都遭剥夺

在旧中国农民遭遇灾荒，可以逃荒求生。⁸⁶但在“大跃进”饥荒肆虐神州大地时，食堂仍被宣传为使农民伙食获得极大改善的制度。为了维持这一神话，所有的媒体奉命封锁发生普遍饥荒这一事实。各级政府出于遮羞和邀功的复杂动机，宁愿将农民困死在本地农村，也不允许他们外出逃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为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国务院从1953年至1957年先后发

⁸¹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提出要给社员一定的自留地，面积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1959年6月11日《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再次要求恢复自留地，且提出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是不准社员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黄道霞等，1992，第568页）。

⁸² 罗平汉（2001，第55页）。

⁸³ 杨继绳（2008，第208页）。

⁸⁴ 见《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转引自新华网。

⁸⁵ 1961年5月11日《刘少奇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广西档案馆29集47卷，转引自武文军（2002，第101页）。

⁸⁶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风阳花鼓”反映了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说风阳，道风阳；风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腰鼓走四方（杨继绳，2008，第230页）。

布一系列指示,1958年1月正式确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城。⁸⁷在大饥荒时期,这一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法律依据。激进地区甚至将这一禁令发挥到了极致,农民不仅不得进城,甚至离开本村庄也得接受审批。逃荒者一旦被发​​现或者遣返,将遭到干部严刑惩罚。⁸⁸

更为无助的是,城市粮食凭票供应,农村粮食集中在食堂的仓库,农民即使能逃出去也难以讨到食物。安徽凤阳县府城公社考成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在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中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有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⁸⁹

四川的政策更为激进。1960年1月,四川金堂县农民因饥饿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县向各区、公社、管理区发出了《关于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规定:“外出劳动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农民外流的一个目的是把粮食省下来给家里人吃,现在外出的人粮食定量被扣,对外出农民是一个致命打击。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哪天不写就扣哪天的饭。⁹⁰食堂制度以连坐制方式将农民牢牢禁锢在本地村庄,在激进地区连食堂停伙期间干部仍禁止农民采集野菜充饥,⁹¹即使允许采集野菜,也要求上交食堂。⁹²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灾年逃荒求生的机制,被食堂制度彻底摧毁,农民只能坐以待毙。

人们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既然食堂在饥荒时期曾处于停伙或名存实亡的

⁸⁷ 1953年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下达《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户口雏形产生。1956年12月30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这个指示等于向农民提出警告:如果你在城市中没有亲友不得进城,否则政府将要进行遣返。1957年3月2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决定在外流人口必经的沿途交通中心和车站,对进城农民进行劝阻。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标志政府不再对盲流温文尔雅,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开始升级。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正式确立。

⁸⁸ 在信阳事件中,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对象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剩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为“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杨继绳,2008,第58页)。

⁸⁹ 杨继绳(2008,241页)。

⁹⁰ 杨继绳(2008,第200页)。

⁹¹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1960年4月接受中监委调查组李坚的询问时说:饿死人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1960年12月6日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就信阳事件说: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杨继绳,2008,第65、72页)。

⁹² 杨继绳(2008,第22—23页)。

状态，这一制度对饥荒触发后不久就不再对饥荒起作用了。⁹³事实上，食堂在断炊之后不得不暂时解散，但一旦夏收或秋收后粮食稍有增加，食堂又被强令恢复。这些做法是有深刻的政治根源的。1958年11月面对食堂开开停停，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局部的”。⁹⁴1959年上半年纠偏中不少食堂解散，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在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食堂在垮掉一部分后，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⁹⁵1960年毛泽东要求对食堂问题“认真抓两大次”，在全国再次掀起兴办食堂的高潮。⁹⁶

食堂在缺粮时暂时散伙，置农民生死于不顾；在粮食状况稍有缓和之际又强令恢复，是不断压榨农民口粮。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非但未减弱反而加剧了食堂的危害。

五、退堂权的复得和饥荒的终结

从全国范围来看，1961年下半年起除四川等个别省份外饥荒即迅速结束，同期农村返销粮显著下降可以说明这一点。⁹⁷如图2所示，农村返销粮具有季节性，⁹⁸1961年上半年农村返销粮比1958年上半年下降了19.7%，1961年下半年农村返销粮比1957年下半年下降了27.5%，降幅相差7.8%。农村返销粮数量受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灾荒严重程度两个因素影响。1961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1957年、1958年分别下降了35.5%、32.3%，降幅相差3.2%，⁹⁹即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因素只能解释部分的农村返销粮下降。1961年粮食产量仍低于1958年、1959年的水平，¹⁰⁰而且中央在1961年春已意识到饥荒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返销粮的削减并非农村粮食增产或政府刻意减少粮食救济，而是饥荒在1961年下半年迅速结束的证据。在1961年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中，¹⁰¹解散食堂、恢复自留地及家庭副业对结束饥荒起到决

⁹³ 例如 Kung and Lin(2003)。

⁹⁴ 杨继绳(2008,第667页)。

⁹⁵ 杨继绳(2008,第671页)。

⁹⁶ 杨继绳(2008,第675页)。

⁹⁷ 1961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14.24%，略低于1959年的14.59%，高于1958年的11.98%。1961年全国人口死亡率比1958年还高的主要原因是，四川、贵州、湖南等几个激进省份饥荒比1958年时更为严重。川贵湘三省1958年超额死亡率分别为14.7%、1.3%、0.7%，1961年高达18.9%、10.6%、6.5%(Chang and Wen,1997, p. 24)。

⁹⁸ 如图2所示，农村返销粮在每年春荒时的四五月份达到高峰，每年年底达到最高值，呈现驼峰形趋势。

⁹⁹ 国家统计局(1980,第112—114页)。

¹⁰⁰ 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950亿斤，1958—1960年分别为4000亿斤、3400亿斤、2870亿斤(国家统计局,1980,第47页)。

¹⁰¹ 调整政策包括：在城市精简城镇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在农村缩小人民公社经济核算单位、开放集市贸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见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柳随年等(1982,第11—14页)，以及《中共中央批准粮价问题小组〈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定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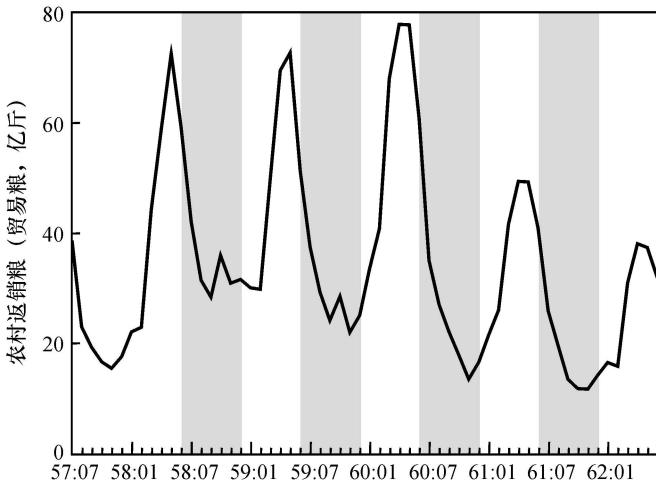


图2 大饥荒期间全国农村返销粮月度数据 (1957年7月—1962年6月)

数据来源: 杨继绳 (2008, 第 857 页)。

(一) 食堂的解散立即提高了农民口粮的消费效率

解散食堂的实质是, 农民立即可以从食堂的仓库里领回本来被强制集体化的那份口粮, 置于自己完全的掌控之下, 获得在自己的厨房中准备食物、以家庭为单位消费食物的权利。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民口粮的消费效率, 因此增强了抵御饥荒的能力。1960年冬,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为解决村民饥馑问题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 决定从公社储备粮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粮食, 增产队可以分15斤, “这些粮食不交给食堂, 由社员回家食用”。1961年年初张家口市市委书记胡开明, 在成功要求省委将该地区口粮定量标准从每天4两提高到6两以后, 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仍然不能免于饥饿。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张家口市提前解散了食堂。¹⁰²可见, 开明的干部深深懂得食堂的危害, 明白即使农民口粮标准提高了, 但只要继续执行指标到户、实物到堂的政策, 农民仍无法摆脱饥荒的厄运。结束饥荒必须解散食堂。

江西省是大饥荒最轻的省份之一。¹⁰³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省份, 解散食堂对农民摆脱饥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61年对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张家洲村的调查, 因为食堂的层层盘剥, 农民口粮至少减少了9.79%。¹⁰⁴1961年

¹⁰² 杨继绳 (2008, 第 494—497 页)。

¹⁰³ 江西省 1958—1961 年累计超额死亡率为 -1.7‰, 在饥荒最严重的 1960 年人口死亡率为 16.06‰, 比 1958 年的 11.34‰ 仅高出 41.6%。见 Chang and Wen (1997, 第 26 页)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第 464 页)。

¹⁰⁴ 龙宇文 (1988), 转引自黄道霞 (1992, 第 586 页)。

春插时节¹⁰⁵小港公社解散食堂，绝大多数农户反映比吃食堂时多吃到一、二成的饭。社员杨桂妹说：“春节后两个多月没吃过一餐干饭，散食堂后我家也是按定量称米下锅，却吃到了两稀一干。”¹⁰⁶在饥荒较轻的江西省尚且如此，在其他饥荒重灾区，解散食堂对结束饥荒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

从全国情况来看，正是由于食堂解散后粮食消费效率的提高，农民才得以在粮食消费量下降的情况下摆脱饥荒。如表3所示，1961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只有154公斤，为新中国历史最低值，比1959年低16%，甚至比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低1.5%，但1961年下半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摆脱饥荒。1962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只有161公斤，比1959年低12.3%，但1962年除四川省（见本节第三小节）仍有大量人口死亡报告外，其他地区的饥荒已完全结束。¹⁰⁷

表3 1952—1966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粮食 单位：公斤/人·年

| 年份 | 全国 | 城市 | 农村 |
|------|-----|-----|-----|
| 1952 | 198 | 240 | 192 |
| 1953 | 197 | 242 | 190 |
| 1954 | 196 | 236 | 190 |
| 1955 | 198 | 214 | 196 |
| 1956 | 204 | 200 | 205 |
| 1957 | 203 | 196 | 204 |
| 1958 | 198 | 186 | 201 |
| 1959 | 187 | 201 | 183 |
| 1960 | 164 | 193 | 156 |
| 1961 | 159 | 179 | 154 |
| 1962 | 165 | 184 | 161 |
| 1963 | 165 | 190 | 160 |
| 1964 | 182 | 200 | 178 |
| 1965 | 183 | 211 | 177 |
| 1966 | 190 | 206 | 186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贸易物价司(1984,第27页)。本表数据为贸易粮。

(二) 自留地及家庭副业及时提供食物补充

既然食堂的强制性要求收回自留地和取消家庭副业，对食堂的松动乃至解散必然导致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恢复。这就为农民及时提供了食堂之外的食物补充。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仍然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食堂，但提出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且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

¹⁰⁵ 中国南方水稻地区春插一般安排在农历春节之后，阳历在每年的3—4月份。

¹⁰⁶ 龙宇文(1988)，转引自黄道霞(1992,第586页)。

¹⁰⁷ 195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14.59%，1962年仅为10.02‰，下降了31.3%。见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2页)。关于四川省1962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见杨继绳(2008,第185—187页)。

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和支配,社员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¹⁰⁸1961年6月修正草案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一律分配到户,规定将自留地面积从原来的5%提高到7%。这是正式给了农民退堂权。食堂的解散从局部地区的试点迅速导致全国食堂的一哄而散。

食堂的解散,口粮归还到农民的家庭厨房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吃饭权的恢复,立即使发还自留地、恢复家庭副业名正言顺。这些变革打破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枷锁,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可支配的粮食迅速增加,粮食的消费效率大大提高。1961年吉林省农村恢复自留地及家庭副业。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可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榆树县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户有19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亩,产量最多的达7担。¹⁰⁹根据刘少奇对湖南宁乡的调查,即使在人多地少的地区,自留地仍为农民及时提供了食物补充。¹¹⁰这非常有助于摆脱饥荒。¹¹¹

(三) 比较四川和安徽

全国局部地区在1960年冬已开始解散食堂,但全国范围解散食堂是在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公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之后。¹¹²此后,全国各地已基本解散了食堂。¹¹³比较四川和安徽两省的情况,可以进一步考察食堂解散在结束饥荒中的关键性。

如图3所示,四川和安徽是大饥荒中死亡最严重的地区。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参考值,1958—1961年全国累计超额死亡率为20.3%,四川、安徽累计超额死亡率分别高达113.5%、58.9%,位列全国各

¹⁰⁸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3月(黄道霞,1992,第635—636页)。

¹⁰⁹ 《关于粮食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1年11月29日(杨继绳,2008,第310页)。

¹¹⁰ 见注85。

¹¹¹ 范子英等(2008,第295页)指出:公共食堂的解散恢复了家庭作为消费单位,这对于后期的农业生产有正面的激励,不过从统计上看主要是对于1964年以后的粮食产量有影响。但从吉林省的情况来看,解散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对生产的激励作用实际上在1961年就显现出来,只不过集体土地上的粮食生产下降了,但农民可直接支配的粮食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而增加了。吉林省的情况在全国具有典型性。

¹¹² 在听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胡乔木等人1961年3—4月一系列的农村调研汇报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办公共食堂的想法。毛泽东这种思想转变体现在1961年3月和6月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对公共食堂态度的变化。

¹¹³ 范子英等(2008)列举了各地公共食堂解散的时间,本文认为其中有误。例如,范子英认为吉林省在1962年3月解散公共食堂。但实际上,吉林省委在1961年11月29日《关于粮食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即报告社员自留地粮食产量过多问题。农民享有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自由,表明公共食堂已解散,或者名存实亡。杨继绳(2008,第324页)指出,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因此,范子英以经济核算单位下放至生产队的时间作为河南、江苏、广东、吉林等地公共食堂解散的时间并不准确。另外,范子英等(2008)认为饥荒的结束是达尔文效应的结果,但从四川和安徽的情况来看,这一假说并不成立。

地区之首。四川、安徽人口死亡率均在1960年达到最高值，分别为53.97‰、68.58‰。1961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率虽下降至29.42‰，但比1957年高1.4倍；迟至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率仍达到14.62‰，比1957年高21.1%。相反，安徽省人口死亡率在1960年达到高峰后，1961年即下降至8.11‰，1962年为8.23‰，均低于1957年9.1‰的水平。可见，四川省1962年还有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安徽省在1961年饥荒实际上已经结束。四川和安徽同为饥荒最为严重的灾区，但为何饥荒结束时间差异如此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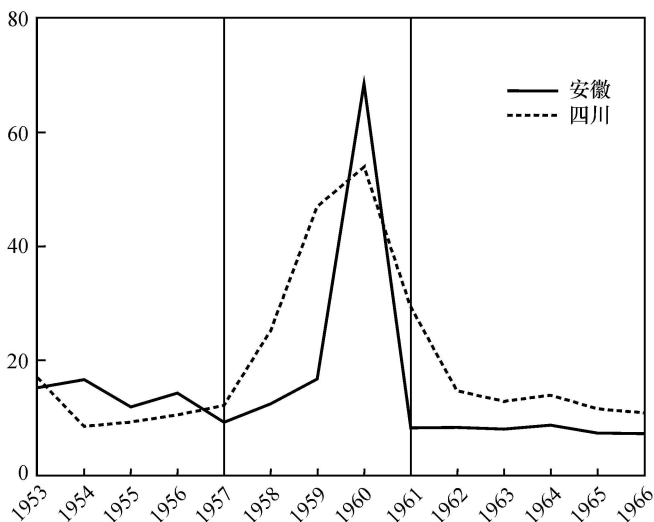


图3 四川和安徽省人口死亡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405、690页）。

四川的李井泉和安徽的曾希圣均为积极拥护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激进人物，但在对待食堂及自留地、家庭副业制度上，曾希圣的转弯远快于李井泉。

1960年安徽饥荒严重程度为全国之最，曾希圣希望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先把问题解决掉。1961年元旦后不久，曾希圣即提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安徽的这一主张先于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更早于6月公布的修正草案。解散食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同时恢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事实上，安徽个别生产队在1960年即已解散食堂退还农民自留地。1961年2月安徽副省长张作荫向曾希圣汇报：安徽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73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楸，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除了口粮种子外，还卖给国家1800斤粮食，向公社交了60元钱。这一案例让曾希圣大为鼓舞，除解散食堂退还自留地外，甚至提出“包产到户”的做法，在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全省推广。至1961年10月中旬，

安徽责任田推广面积达84.4%。¹¹⁴

恰成对比的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不仅在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工作中开“顶风船”,坚持办食堂收回自留地;而且在1961年春夏中共中央对坚持办食堂态度转变之际,李井泉仍然对食堂情有独钟。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紧急指示中规定:将80%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5%。四川省委则规定: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办食堂“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约自得”。四川省委的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约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表扬四川坚持办食堂,李井泉更加确信坚持办食堂符合毛泽东的意图。¹¹⁵

1961年春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国各地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不断,1961年3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再次提出社员口粮可以分配到户,并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然而,1961年5月11日李井泉在四川内江给毛泽东写信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仍然坚持主张办食堂,并将这份报告印发给四川各地委、州委作为农村工作指导。¹¹⁶在许多省份1960年先后解散食堂时,四川省坚持“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还要“积极办好”,从而延长了四川省饥荒时间。¹¹⁷直至1962年四川省委才允许农民退出食堂,于是死亡人数得以迅速下降。¹¹⁸

可见,安徽在1961年年初即解散食堂迅速结束饥荒,四川省推迟一年解散食堂,导致该省的饥荒也推迟一年才结束。

六、小结:食堂对饥荒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制度是“大跃进”饥荒最主要的成因。图4描述了食

¹¹⁴ 杨继绳(2008,第294—295页)。

¹¹⁵ 杨继绳(2008,第175—176页)。

¹¹⁶ 杨继绳(2008,第686—687页)。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奉行极“左”政策的地方大员中,甘肃张仲良、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安徽曾希圣在1961年前后都受到“党内处分”,被撤销原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唯独四川的李井泉不仅保住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还于1961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任命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文革”爆发后才受到“冲击”被“罢”了“官”。可见,李井泉在四川的政策得到一贯的执行。

¹¹⁷ 张孝理等(1989,第10页)。事实上,四川省在1962年还有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报告。(杨继绳,2008,第185—187页)

¹¹⁸ 文贯中(2009)。

堂制度触发、加剧及结束饥荒的作用机制。1961年农民日热量摄入量达到最低水平，中国却于该年走出饥荒。因此，图4用该年农民人均日热量摄入量作为最低维生水平，低于该水平必然导致饥荒。食堂库存的口粮是扣除净征购粮、象征性的工资分配、集体提留后的剩余，在大多数地区仅够农民集体以略高于维生水平的日热量摄入量维持生存到下一次收成到来之时。1958年秋冬实行的“敞开供应，免费吃饭”政策，使农民实际粮食消费量高于名义消费量，造成巨大的粮食浪费，触发了一些省份1958年冬和许多省区1959年春的饥荒，但当时饥荒尚未严重化。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庐山会议后食堂制度死灰复燃，为农村干部的贪污、滥权行为提供极大的方便，使农民实际粮食消费量不仅低于名义消费量，而且大大低于维生水平。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取消则彻底切断了农民生产自救的渠道，加上农民传统的逃荒机制也被食堂制度所摧毁，从而加剧了饥荒。1961年春起全国各地纷纷解散食堂，重新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口粮，迅速提高了农民粮食消费效率；自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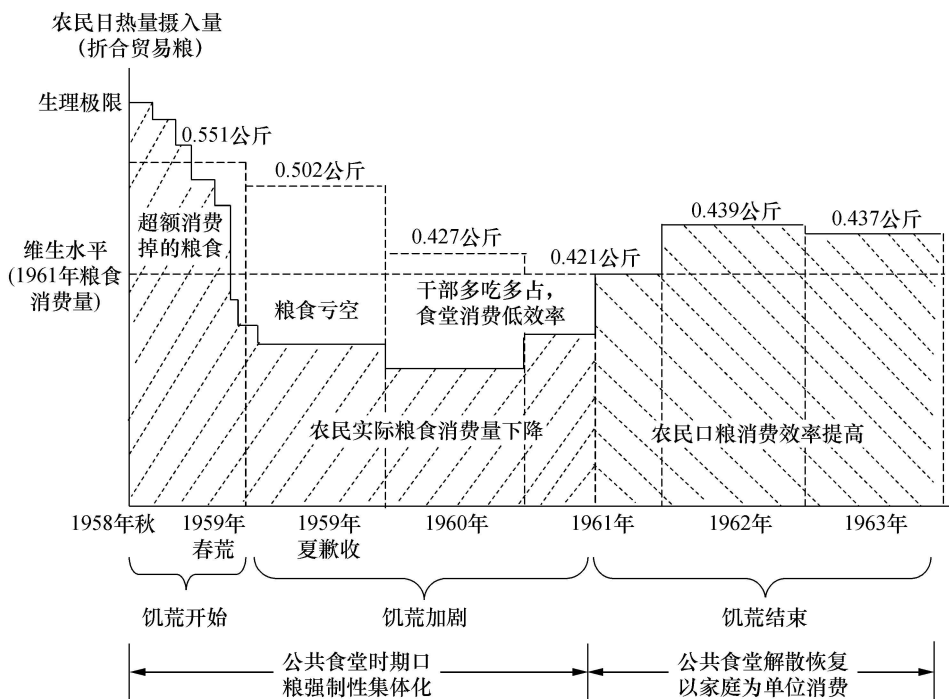


图4 食堂触发、加剧及结束饥荒的机制

注：纵轴表示农民日热量摄入量（折合贸易粮消费量），横轴表示时间，水平虚线以上数字表示农民名义的热量摄入量，阴影部分表示农民实际的日热量摄入量。各年农民名义热量日摄入量（折合贸易粮）根据表3各年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除以365得到。因为饥荒在1961年下半年结束，本文以1961年农民人均日粮食消费量作为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低于维生水平、高于阴影的空白部分表示饥荒的严重程度、原因和延续的时期。

和家庭副业的恢复则提供了及时的食物补充。所有这些使农民实际粮食消费量等于名义消费量且至少不低于维生水平,农民在人均粮食消费量最低的1961年年中后得以走出饥荒。

因此,离开食堂制度,我们就无法理解饥荒为何在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处于较高水平的1958年冬1959年春爆发,更无法解释饥荒为何在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处于最低值时迅速结束。

七、简单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退堂权的丧失及复得对触发、加剧和结束饥荒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节将利用25个省区1958—1962年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以研究饥荒各成因的实际效应。

(一) 数据及模型

如图5所示,大饥荒人口死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农村人口死亡率取决于三个潜在因素:考虑征购及返销后的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政治激进主义(高消耗工程)、食堂。因此,本文设定基本模型(1):

$$\ln dr = \beta_0 + \beta_1 \ln g_{it} + \beta_2 \ln hi_{it} + \beta_3 \ln cdh_{it} + \alpha_i + \mu_{it}. \quad (1)$$

其中 i 为地区, t 为年份; dr 为地区死亡率, g 为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于粮食产量(贸易粮)一征购量+农村返销粮。如何衡量政治激进主义和食堂因素是一个难点。Kung and Lin (2003)分别以各地区解放时间TOL及1959年年底食堂参与率MHPR来衡量高消耗工程 hi 及食堂因素 cdh 。但对于每个地区来说,TOL和MHPR只有一年的数据,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会被舍弃掉。

高消耗工程包括大兴水利和大炼钢铁,但地区灌溉面积、钢产量数据不完整。“大跃进”运动的本质是实施赶超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钢铁生产是重工业的核心。¹¹⁹在“大跃进”时期,各地区大炼钢铁必然提高该地区重工业产值及其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因此,本文以地区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政治激进主义(高消耗工程)的代理变量。如图6所示,钢产量与重工业产值比重变化趋势一致,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钢产量及重工业比重在1958年开始迅速提高,1960年达到最高值,1961年开始下降。可见,重工业比重反映了该地区以高消耗工程为主的政治激进程度。

¹¹⁹ 例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以钢为纲”。见薄一波(1997,第6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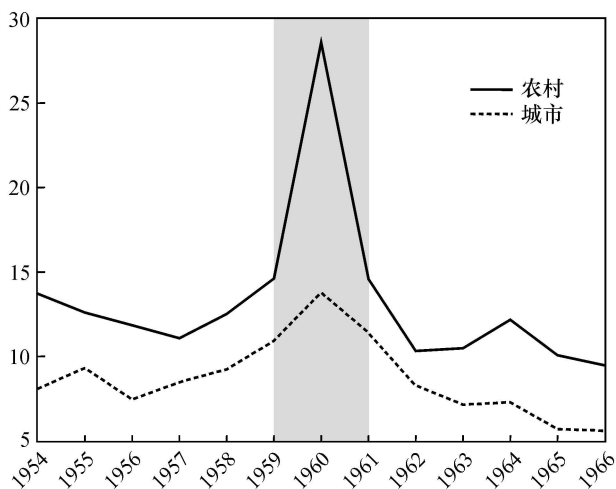


图5 1954—1966年城乡人口死亡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1，第8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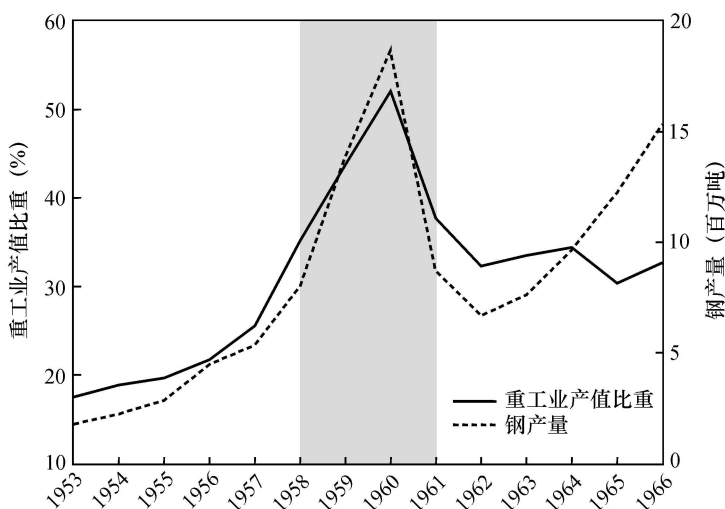


图6 重工业产值比重及钢产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10、18页）。

如上所述，食堂与家庭副业一脉相承。1958年秋兴办食堂刮起了共产风，家畜家禽被农民提前宰杀吃掉；在办食堂过程中大量家畜家禽因缺乏饲料及照料不周而死亡；在1961年前后解散食堂后，自留地及家庭副业得以恢复，家畜家禽饲养量又迅速增加。猪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家畜，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饲养。如图7所示，从1958年开始，全国年底猪存栏数持续下降，1961年年底降至最低的75.52万头，比1957年年底下降了48.2%；1962年猪存栏数开始上升，1964年已超过1957年的水平。因此，猪存栏数可以反映各地

区各年食堂激进程度, 可以作为食堂制度的代理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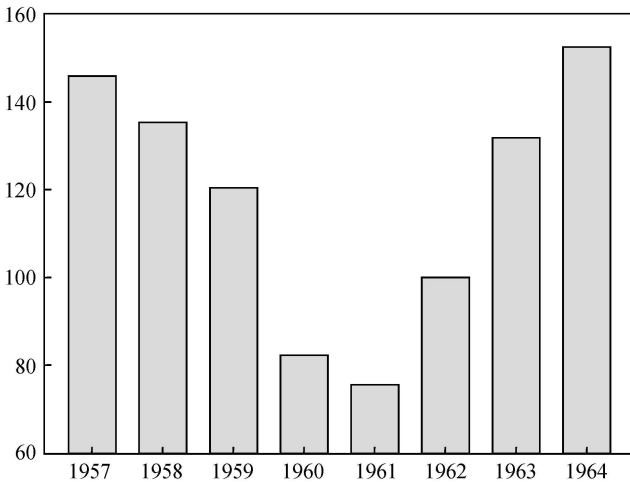


图7 1957—1964年年底猪存栏数(百万头)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第13页)。

为了与 Kung and Lin (2003) 的实证结果相比较, 本文考虑粮食征购及农村返销粮因素设定模型(2):

$$\ln dr = \beta_0 + \beta_1 \ln g'_i + \beta_2 \ln hi_i + \beta_3 \ln cdh_i + \beta_4 \ln netpr_i + \beta_5 \ln ruralp + \alpha_i + \mu_i. \quad (2)$$

其中 hi 和 cdh 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 g' 为人均粮食产量, netpr 为粮食净征购率, ruralp 为农业人口比例。各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4。

表4 变量统计性描述

| Variable | Obs | Mean | Std. Dev. | Min | Max |
|----------|-----|-------|-----------|-------|-------|
| lng | 125 | 5.287 | 0.240 | 4.820 | 6.040 |
| lng' | 125 | 5.434 | 0.229 | 4.945 | 6.175 |
| lnhip | 125 | 3.405 | 0.438 | 2.364 | 4.303 |
| lnpig | 125 | 5.518 | 1.117 | 2.375 | 7.863 |
| lnnetpr | 125 | 3.087 | 0.420 | 1.702 | 4.088 |
| lnruralp | 125 | 4.384 | 0.136 | 3.580 | 4.528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9)。

(二) 估计结果

本文模型考虑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 因此分别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分析, 并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合适的分析方法, 具体结果见表5。模型回归分析证明, 食堂制度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表5 模型回归结果

| 自变量 | (1) | (2) | (3) | (4) |
|----------------------|--------------------|--------------------|-------------------|---------------------|
| | RE | FE | FE | FE |
| lng | -0.42** (0.18) | -0.024* (0.23) | -0.033 (0.24) | |
| Lng' | | | | 0.144 (0.36) |
| lnhi | -0.067 (0.12) | | 0.119 (0.20) | 0.220 (0.20) |
| lnpig | | -0.643* (0.12) | -0.650* (0.13) | -0.612* (0.13) |
| lnnetpr(lag) | | | | 0.240** (0.10) |
| lnruralp | | | | 0.268 (0.30) |
| Year ₁₉₅₉ | 0.167*** (0.09) | 0.159*** (0.08) | 0.124 (0.11) | 0.110 (0.10) |
| Year ₁₉₆₀ | 0.473* (0.11) | 0.286* (0.10) | 0.225 (0.14) | 0.150 (0.16) |
| Year ₁₉₆₁ | -0.049 (0.10) | -0.252** (0.10) | -0.275* (0.11) | -0.238*** (0.13) |
| Year ₁₉₆₂ | -0.305* (0.08) | -0.334* (0.08) | -0.327* (0.08) | -0.261** (0.11) |
| Constant | 4.961* (1.03) | 6.309* (1.34) | 6.012* (1.44) | 2.578 (2.68) |
| R ² | 0.41 | 0.63 | 0.63 | 0.66 |
| Hausman P Value | 0.99 | 0 | 0 | 0.01 |
| Observation | 125 | 125 | 125 | 125 |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方程 (1) — (3) 直接考虑控制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情况下，政治激进主义和食堂因素对饥荒的效应。方程 (1) 表明，政治激进主义对饥荒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显著影响地区死亡率，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每减少 10%，地区人口死亡率增加 4.2%。方程 (2) 表明，在考虑食堂因素后，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对地区死亡率的作用弹性下降，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 10%，地区人口死亡率增加 0.24%；猪存栏数每下降 10%，地区人口死亡率增加 6.42%。方程 (3) 表明，如果同时考虑政治激进主义及食堂因素，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对饥荒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政治激进主义虽然加剧了饥荒，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食堂因素显著加剧了饥荒，猪存栏数每下降 10%，地区人口死亡率则增加 6.5%。

方程 (4) 同时引入人均粮食占有量、政治激进主义、食堂、城市偏向等因素，发现政治激进主义虽然与死亡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食堂和粮食高征购才是大饥荒的主要成因。其中，猪存栏数每下降 10%，地区人口死亡率则增加 6.12%；粮食净征购率每提高 10%，地区死亡率则增加

2.4%。由于模型控制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因素,猪存栏数的变化实质是由各地区执行食堂制度的激进程度决定的,方程(4)结果说明,食堂因素对饥荒的作用弹性是粮食高征购因素作用弹性的2.5倍。

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大兴水利和大炼钢铁,修水利抽调的农村劳动力在最高峰时达到1亿人,¹²⁰占1957年农村劳动力的51.8%。¹²¹事实表明,由于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加上口粮供应不足,不少农村劳动力因健康因素而死亡。为何本文回归模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实际上,食堂分析框架已涵盖高消耗工程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在农村抽调修水利或炼钢铁的劳动力,其口粮仍然是从农村食堂中划拨的,集中在工地食堂开伙吃饭。1958年大修水利和大炼钢铁期间一度放开肚皮吃饭浪费了不少粮食,¹²²其后由于农村口粮不足,加上干部滥用权力对工地上的农民施以扣饭等各种刑罚,加剧了饥荒。¹²³因此,食堂制度的危害已蔓延至水利及炼钢工地。

八、结论:食堂退出权的重要性

本文旨在强调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民不但因退社自由权的被剥夺导致农业生产率在二十多年的长时期处于低水平,而且在其早期还因被剥夺了从公共食堂自由退出权而导致了空前的饥荒。“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而食堂则使“口粮集体化”成为国家强制推行的制度,个人自由得以有所保存的最后领地——家庭,也被食堂制度摧毁了。在赶超战略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下,中国农民被迫走上这条不归路,并为此承担了致命的后果。

如果说农民丧失退社自由权仅意味着生产自主权被剥夺的话,那么,将集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的强制性食堂制度所剥夺的就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吃饭权,使农民陷于制度性绝境。食堂利用对饭勺子的控制,即通过对肚子的专政实现了对人的最全面的控制,¹²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远远

¹²⁰ 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增加,1957年10月为两三千万,11月为六千万,12月八千万,1958年1月达到一亿(薄一波,1997,第681页)。

¹²¹ 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为1.93亿(国家统计局,1980,第5页)。

¹²² 例如,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炼钢铁,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还动用了200万人,这些工地上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消耗了一些粮食,减少了生产队的留粮。四川省绵竹县红旗公社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全社抽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斤米,上山5个月共带走66万斤大米;1958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杨继绳,2008,第36,177页)。

¹²³ 安徽凤阳的情况最典型。“大跃进”以来,安徽凤阳县搞了不少水利工程,建设电灌站是凤阳当年的一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工地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农民工口粮12万余斤。水利工地上规定: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的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杨继绳,2008,第249页)。可见,农民工的口粮被工地食堂牢牢控制。

¹²⁴ 杨继绳(2008,第679页)。

超过 Lin (1990) 指出的退社自由权的丧失所造成的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危害,对民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不幸影响也更为深远。¹²⁵在“大跃进”饥荒 50 周年之际重温这个沉痛教训,算是向当年几千万因被剥夺退堂权而深受伤害、惨遭践踏,乃至成为饿鬼的农民表示深深的哀悼,并希望对中国早日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有所启迪。

参考文献

- [1] Alsop, J.,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1, 21—37.
- [2] Ashton, B., K. Hill, A. Pizza, and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4), 613—645.
- [3] Becker, J.,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
- [4] Bern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 339—377.
-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6] 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
- [7]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 [8] Chang, G., and G.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34.
- [9] Chang, G., and G. Wen, "Food Availability versus Consumption Efficiency: 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57—166.
- [10] Chen, Y., and L. Zhou, "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61 Famine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7, 26(4), 659—681.
- [11] Coale, A.,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
- [12] 党国英,“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南方周末》,2007年9月28日。
- [13] Davies, R., and S.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14] Eckstein, A. et al.,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2, 19—53.
- [15]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第104—113页。
- [16] 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卷第2期,第487—512页。
- [17]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 1959—1961 年大饥荒终结于 1962 年”,《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8卷第1期,第287—306页。

¹²⁵ Chen and Zhou(2007)发现大饥荒造成长期的健康和经济不良后果,对那些在饥荒时期处于幼龄阶段的人影响尤为严重。他们根据个体数据估计,如果没有 1959—1961 年大饥荒,1959 年出生的人身高将增加 3.35 厘米,总劳动力供给将增长 28%,人均农业收入将提高 38%。

- [18] 费正清、麦克拉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19]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80年。
- [2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
- [21] 国家统计局贸易物价统计司,《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1952—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
- [2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 [23] 胡代光,“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公共食堂是怎样办起来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58年第4期,第97—104页。
- [24] 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 [25]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46、64页。
- [26]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第56—63页。
- [27]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第94—106页。
- [28] Johnson, G., “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03—109.
- [29]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 [30]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4页。
- [31] 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第76—90页。
- [32] Lin, J., and D. Yang,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25—140.
- [33] Lin, J., and D.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9(460), 136—158.
- [34] Lin, J.,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228—1252.
- [35] 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19—1142页。
- [36] 柳随年等,《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
- [37]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38] Mallory, W., *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 [39] 农牧渔业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1983年11月,第172、390页。
- [40] O’Grada, C. 2007, “Making Famine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1), 3—36.
- [4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 [42] Peng, X.,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 13(4), 639—670.
- [43] Ravallion, M.,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3), 1205—1242.
- [44] Riskin, C.,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11—124.

- [45]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 Oxford, U. K.: Clarendon Press, 1981.
- [46] Sen, A.,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1983, 93(372), 745—762.
- [47] 《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编辑委员会,《山东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 [48] 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
- [49] W. K., Communist China's Agricultural Calam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 6, 64—75.
- [50] Walker, K.,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1] Wen, G., "The Current Land Tenure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Long Term Performance of Farming Sector: The Case of Moder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 [52] Wen, 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 1952—198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3, 42(1), 1—41.
- [53] 文贯中,“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论无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谋杀性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
- [54] 武文军,“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载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 [55]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56] 薛暮桥,《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57]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8] Yang, 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amine of 1959—1961: A Survey and Comparison to Soviet Famin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 50, 1—29.
- [59] Yang, D., and F. Su, "The Politics of Famine and Reform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41—156.
- [60] 杨大力,“‘大跃进’与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48期。
- [61]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 [62] Yao, S., "A Note on the Causal Factors of China's Famine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6), 1365—1369.
- [63] 张孝理,《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 [64] 赵发生,《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 [65] 赵继士,“一九六零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陇南市政协委员会,2008年11月4日,载于“礼县之窗”网站(www.lxzc.gov.cn)。
-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 [6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 [68]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映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4—64页。

On the Causes and Lessons of Great Leap Famine: Rights Lost and Regained by Chinese Peasants to Free Exit from Communal Dining Halls

GUANZHONG JAMES WE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YUAN LI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the materials that become available only recently and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logic,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he rise, dissolution, reconsolidation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and final sudden disbandment of the communal dining halls, which we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plots and sideline production and compulsory collectivization of farmers' all food rationing, a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start, exacerbation and end of the Great Leap Famin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the free exit right lost and regained from communal dining halls in explaining the rise and the end of this unprecedented famine.

JEL Classification N55, O18, Q18